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丝绸

中国与欧洲宗教哲学交流研究

之路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

中国与欧洲宗教哲学交流研究

张西平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中国与欧洲宗教哲学交流研究 / 张西平著.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2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ISBN 978-7-228-14123-4

I. ①丝… II. ①张… III. ①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文
化交流—研究—中国、欧洲—明代②丝绸之路—哲学—文化
交流—研究—中国、欧洲—明代 IV. ①B929.2②B24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4928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2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6 开
印 张 24 印张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81.00 元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 屹

副 主 任 祝 谦 石永强

编 委 陈重秋 周菁葆 苗晋生

沈福伟 张国刚

主 编 张新泰 李维青

主 编 张 田(执行)

策划编辑 张 田 李春华 罗 沛

英文翻译 崔延虎

整体创意 张新泰

装帧设计 王 洋



出版说明

形成于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①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为我们揭示出东西方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纵观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它不仅凝结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且汲取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高度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华文明”。^②

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图书——《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出版,不仅为国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0年过去了,伴随着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为了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在丝

①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32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

绸之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2008年年初,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重新编辑出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新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除了保留原有的几种选题之外,又从中国已出版或待出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了20余种有代表性的选题列入丛书,计划分批推出,陆续出版。这批研究成果,以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为主线,以西域研究为重点,注重突出学术著作的创新性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内容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由于入选的研究成果在出版时间上跨度较大,此次再版前均由作者对书稿内容做了全面修订,有的甚至做了重大修改,补充了新的资料,借鉴了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为了使读者了解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进展情况,我们特邀请中西文化交流史著名学者、苏州大学教授沈福伟先生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文中的精辟论述和真知灼见,是读者开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一把钥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自始至终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关心和支持。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对丛书选题的书稿进行了学术评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从而保证了丛书的学术质量。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所限,丛书在编辑中难免挂一漏万,有所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12月6日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学研究

(总序一)

丝绸之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丝绸之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丝绸之路概念最早是19世纪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的欧洲探险家提出来的。在当时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西部地区在古代曾经呈现过的多元文化的一种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历史上这些由多民族创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认同。它之所以产生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的时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19世纪中叶,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了丧权辱国、危机四伏的国难时期。英、俄等欧洲列强首先对中国西部边疆实行蚕食政策,掀起了一股以地理考察为名的探险热。当时走在这股热潮前列的是德国巴登—符腾堡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68年李希霍芬接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第二次到中国考察,到达上海后受英国商会委托,对中国地貌和地理首次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省中的15个省,还到了东北(满洲),摸清了中国的资源和开发的前景。1872年返回德国后,李希霍芬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会长,致力于写作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s 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1877~1912年, 5 vols.),到去世前出版了1、2两卷。他从亲身的考

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这和中国领土受到西方列强的蚕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受到李希霍芬的影响,他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追踪他的足迹,先后7次到中亚和中国西部进行地理考察和考古发掘。差不多同时,俄国人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Nicholas Przwevalsky)和奥勃鲁契夫(Obrochev)、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 Stein)、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Le Coq),先后率领探险队,在世纪之交进入中国新疆和西部地区。他们在楼兰古址进行田野发掘,堂而皇之拿走了新疆石窟寺院中的彩塑佛像,将尘封已久的吐鲁番盆地的古物成箱运出中国国境。他们还设法进入了敦煌石窟的藏经洞,攫取了前所未闻的精美壁画、塑像、铭记、经卷和丝织品。原先保存在石窟寺和遗址中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成了伦敦、巴黎、柏林、新德里和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莱比锡)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论证。后来赫尔曼在他编著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哈佛燕京学社,1935)一书中加以宣扬,从而使丝绸之路为世人所熟知。

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当时欧洲人设计的西方文明框架,是以地中海世界为主体的一大文化圈,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古文明一一囊括入内,并称其为“中东”,剩下的东亚(欧洲人称为“远东”)和中亚(欧洲人称为“突厥斯坦”),无非是西方文明东扩的支脉而已。可见在国家丧失主权以后,学术无法自主的情况下,文化的研究、历史的阐释要取得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

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所以在阐释东亚文明的形成过程时出现了以上各种各样的,从人种到文化全都来自西方的说法。尔后50年,不仅仅是由于丝绸之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更多的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得力于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考察,有了重大的进展。由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经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这样的研究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绸之路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先前已五次来华进行地理考察与探险活动,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斯文·赫定,会同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的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的。由于这样的共识,1927年经过南京政府核准,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科学考察团由徐炳昶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担任瑞典团长,从北京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经过河套、宁夏,奔赴新疆哈密、吐鲁番,抵达乌鲁木齐。1930年10月科学考察团调整阵容后,扩大到调查楼兰古道和罗布泊,测绘塔里木盆地,考察甘肃古迹和戈壁沙漠,还到内蒙古进行民族学调查,去川藏边境考察动植物。考察工作在1935年告一段落,作为总结,斯文·赫定在同一年用英文出版了《丝绸之路》一书。科学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绸之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开展多元文化研究,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丝绸之路学研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入第二个高潮。在1959~1975年间,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物管理所牵头,对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上万件极具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文书,在1992年出版了10卷本《吐鲁番文书》的释文。在这段时间里,卷帙浩繁的敦煌学已从丝绸之路学的分支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983年8月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标志着自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到丝绸之路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走过了最初的100年。其中最后的50年,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奋进,终于扭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绸之路学中心在西方”的那种令中国人陷入丧失民族自尊的窘境。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就是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学这一研究领域所推出的部分成果。

丝绸生产技术在6000年前人类文明史中极具工艺价值的一项伟大发明,它诞生在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

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根据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交流大约进行了2000年之后,像波斯、拜占庭这样的文明古国,才从中国学到了从养蚕、缫丝到纺纱、织锦的全部工艺流程。因此,丝绸之路提出的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丝绸之路学的研究,也必然是一项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这算是我在这套丛书出版时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供各位专家学者探讨。

沈福伟

2010年11月10日于苏州大学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总序二)

欧亚大陆上不同区域的人群在史前时期就有往来迁徙活动，高加索人种至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文明在其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在当时条件的许可之下参与各种文明的交换与交流。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以及华夏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对于塑造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都有重要作用。

文献记载表明，先秦时期的黄河流域就与葱岭以西地区有较牢固的联系，而遥远的古希腊也具有对远东地区的模糊认识。昆仑山玉石的东输对于中原玉文化的兴盛有非凡作用，斯基泰人的东迁南下对于中亚和南亚的人种与文明有着深刻影响，两者更表明中原与西方的交通道路在远古时期便实际存在。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就在今天阿富汗市场上发现了绕道印度而来的中国四川地区的纺织品和竹木制品。可见，汉代中国政府开辟丝绸之路和经营西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远古交通道路的重新认识和拓展，但更重要的意义是中原地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延伸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此后各朝政府都延续了这种对外交往的传统，并于唐代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了地中海地区、阿拉伯地区以及波斯、中亚、南亚、东亚往来互通的交流格局。西方各地区的文化汇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更新的重要动力，中国的特产渐次西传，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西方诸地的生活习惯。元代的欧亚大陆交通达到空前畅通，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

丝织品名副其实为中国的独特创造。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和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都发现了丝织物,意味着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蚕丝织物的生产。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则与丝绸有密切的关系,以致后世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交流通道统称为丝绸之路,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产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春秋战国之际,东西方之间已经沿着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陆交通路线开展丝绸贸易。被认为写于公元前5世纪阿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The Achaemenid Empire of Persia)的《旧约·以西结书》(Ezekiel, 16:10; 16:13)有一段提到耶和華要为耶路撒冷城(Jerusalem)披上最美丽最豪华的衣裳。耶和華在形容世间最美丽的织物时两次提到“丝绸”。这意味着此时的波斯帝国内已有中国丝绸。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和色诺芬(Xenophon)也说波斯人喜爱米底亚(Medea)式的宽大上衣,而此种衣物的材料正是后来被希腊人称为“赛里斯”(Seres)的中国丝绸。这种轻薄衣料的来历令希腊人浮想联翩,如猜疑出产于羊毛树上,或推测得之于蜘蛛腹中。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同一时期丝绸也已传至欧洲,因为所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希腊雕刻和彩绘人像所穿衣服都极为稀薄透明,似为丝绸面料。汉唐时期,丝绸不仅是北方陆路交通线上的主要贸易品,也是中国政府赐赠西方国家的主要礼品。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在丝绸还未成为主要贸易商品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存在。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它们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Altay)、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这是古代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的通道,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南行至阿勒泰地区。绿洲之路是指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戈壁之中的绿洲城邦国家开拓出的,连接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过高山峻岭的一个个山口道路。这条通道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据说周穆王西巡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虽说穆天子的故事未必真实,但考古发现已将这条道路的出现时间追溯到远早于周穆王的时期。尽管自中原通往中亚以及西亚、南亚、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方的贸易通道在很早以前就已自然地存在,但其真正的辉煌与繁荣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体现,则始于汉唐时期。从此,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同时中国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

说道中西文化交流,还不能不强调西域。

西域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历史地理概念。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且不

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与唐代的西域概念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西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动的地理区间。随着唐王朝势力向中亚、西亚的扩展,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并因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西域则被用来指安西和北庭以远的、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地区,具体而言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但西域的政治军事功能与汉朝相同,都是作为“内地”的屏藩,并且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过程中,各自的西域地区也确实起到了政治缓冲作用。唐朝广义的西域概念也比汉朝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而在汉朝广义西域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丝绸之路研究所讲的西域,指的就是两汉时期狭义上的西域概念。该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两汉政府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结构,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其作为中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屏障。从地理位置看,狭义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英国学者斯坦因(M.A. Stein)将其称为“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环山,地球上几大文明区域在此发生碰撞。不过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并未使其与周围世界隔离,一些翻越高山的通道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优势免遭彻底同化。上述地理特征也造就了西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交汇点的文化特征,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可以找到众多古代文化的影子,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的个性张扬,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西域并不同于西方。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地域而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步伐的演进而转移,大致在明朝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与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然而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在文化上始终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异域文化。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块代表非我族类之外来文化的神秘地方。

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绝域)的观念。东亚世界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在东亚世界

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化,就可以被纳入朝贡国的地位,否则就有可能兵戎相见。因为古代国家的安全观,乃是以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与异来确定,文化上的认同是界定国家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这样看来,西域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既可作为“天下”的边缘地区,又可视为“天下”与“绝域”的中间地带。这也正是西域的独特性所在。

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我看了丛书选题目录及其作者,大都是能体现丝绸之路研究学术特色的上乘之作。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能够看到即将有如此众多的成果问世,由衷感到高兴,应约写下如上文字,权当为序。

张国刚

2010年11月23日于北京清华园



前言

16~18世纪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史是“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①。中国史学界对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应源于20世纪初,经张星烺、向达、陈垣、冯承钧等前辈的开拓^②,继而方豪、张维华、朱谦之、陈受颐、范存忠、钱钟书、阎宗临等学者从不同的方向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学科的研究^③,使20世纪20~40年代这一学科所达到的成就在许多方面至今仍未被我们当代学者所突破,他们的书仍是我们研究与学习的必备之书。在学风浮躁的今天,看了这些前辈大师们的书,再翻那些应景之作,真是感慨颇多。

对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真正恢复应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④,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林金水的《利玛窦与中国》、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潘吉星的

① [荷]许理和:《17~18世纪耶稣会研究》,见《国际汉学》第4期,第429页,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卷本),辅仁大学出版社,1930年版;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陈垣等:《民元以来天主教史论集》,辅仁大学出版社,1943年版;冯承钧:《西域南海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③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受颐:《明末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他》,见包遵彭主编:《明史论丛》,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陈受颐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The influence of China on English culture the eighteenth century”及以后的多篇论文);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钱钟书:“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seventeenth century”,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New Series)vol.(1940);《阎宗临史学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④ 8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是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由何兆武先生执笔的第二十七章“明末天主教输入什么‘西学’?具有什么历史意义”。台湾、香港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尤其是吴相湘主编的《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三编)为这一学科提供了基础性文献,贡献极大。参阅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国际汉学》第4期,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中外科学之交流》(香港版)、曹增文的《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许明龙的《欧洲18世纪“中国热”》等一系列著作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谢方先生所主编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着眼于基础文献建设,何高济、耿昇、金国平的一系列译著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海外研究的珍贵文献,这些都是这一领域研究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西方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仅局限在传教学的范围内,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许多著作护教色彩很浓,从而使许多有关耶稣会传教士的传记著作停留在为宗教服务上,这样和中国一样,欧洲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开拓性的研究仍是由耶稣会内的学者完成的,如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所编的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Fonti Ricciani, Storia dell Cristianesimo in Cina*),费赖之(L. Pfister)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s. J.)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这些都是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大多仍以耶稣会士为中心,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产生的反应与影响以及基督教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进程的作用等问题,都显得研究不够深入。以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和钟鸣旦(Nicolas Standert)的《杨廷筠,晚明的儒学和基督教》为代表,西方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开始了一种“汉学转向”,即“汉学关系到(前现代的)中国;无论我们做什么,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国文化的传入的反应方式)应该总是我们研究的首要问题”^①,这是近20年的事情。几乎在同时,一些西方学者着力于探讨耶稣会士在“原汉学”中的重要作用,即研究通过耶稣会士所带来的中国文化的西传。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的《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已被中国学者所注意,在这方面西方还有一系列著作,尚未被中国学界重视,比如有极高参考价值的拉克的《亚洲在欧洲形成中》这样的作品。^②

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动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笔者也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学术关怀开始本书的写作的,上面所谈的国内外研究的进展也为本书的论证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学术研究历来是“接

① 许理和:《17~18世纪耶稣会研究》,《国际汉学》第4期,第444页。

② 孟德卫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

着说”，这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同时任何学术的研究都是研究者的“我来说”，这是研究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探索、新的努力、新的尝试。因此，希望读者能在我的枯燥的文献考证与抽象的理论分析背后注意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究竟传入了哪些西方宗教和哲学思想，这些西方思想从理论本身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构成了什么关系。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要么只侧重历史的叙述，而思想这个核心问题被忽略了；或者在思想的研究中把传教士的理论作为一种现实接受下来，而没有注意他们这种理论的来源以及面临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变化和新的叙述形式。因此从传教士的中文文本出发，研究这种思想来源与表述的变异成为本书上编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笔者努力把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宗教与哲学同中国宗教和哲学做一种理论上的比较与分析，尽管这种对比研究主要不是从具体的接受个案来进行的（无论是拥护基督教的，还是反对基督教的），但这种理论的分析与对比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无论是拥护基督教的还是反对基督教的个案，都不具有普遍性，都无法从根本上回答基督教在前近代中国的命运及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甚至从不同的个案分析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当然作者并不反对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研究各类个案，其实这也正是作者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之一，强调这一点只是说明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实际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文化转型的今天，我们如何会通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至今仍是一个悬案，许多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仍未得到满意的回答。加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1840年以后扮演着十分复杂的多种角色，从而使这个问题政治化和复杂化。就历史而言恰恰是16~18世纪这一时期能供给给我们更多有用的思想资源，它能对我们如何消化基督教文化或者反过来说西方的基督教如何面对中国文化，提供了极典型的、纯粹文化上的范例。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对话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可以从这一纯粹的文化对话中得到启示。

第二，在世界近代史的范围内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就明清间的中西文化交流来说，中国学者关心更多的是基督教文化的传入所造成的反应与影响^①，而对耶稣会士们所完成的“中学西传”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朱谦之先生是这一方面研究的开拓者，钱钟书、陈受颐、范存忠、阎宗临在海外的学位论文至今未译成中文，还不能为更多的人使用。同时这一时期的传教士使用多种语言写作，尚有

^① 近20年西方学界所谓从“传教学研究”到“汉学研究”的转向只是从他们的学术脉络来讲的，就中国学术界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主要的（虽然对教内学者来说有一个克服浓厚的扬教心态所带来的局限问题，黄一农已指出了这一点，见《国际汉学》第4期），甚至可以说中国学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接受与反应”这一方面，陈垣的《汤若望与木陈忞》、《泾阳王微传》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